

# 《平巢事迹考》为茅元仪所著考

——兼及茅元仪著作

臧 嵘

唐末王仙芝、黄巢起义的始年，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而在争论中，《平巢事迹考》向来为持王仙芝、黄巢起义于公元874年（唐僖宗乾符元年）说的一条重要论据。例如韩国磐同志在《黄巢起义事迹考》一文中，就引用了该书中的一段：

唐僖宗乾符元年，濮州人王仙芝作乱，聚众数千人，起于长垣。并说：“《通鉴》和《平巢事迹考》都是宋人的著作。”<sup>①</sup>杨新同志在《唐人书黄巢起义记事墨迹》一文中亦认为：“《平巢事迹考》的作者为宋人”，作者也将该书中前引一段记载依为重要实据，论证王仙芝、黄巢起义确在公元874年（即乾符元年）<sup>②</sup>。

笔者是不同意上述看法的。除已著专文论证王仙芝、黄巢起义皆始于公元875年（乾符二年）<sup>③</sup>外，兹作此文，说明《平巢事迹考》不是出自宋人之手，而是明末茅元仪所著。

其实，《平巢事迹考》的作者为茅元仪，早在清人著作中就有人

①《隋唐五代史论丛》364页。

②请参阅《文物》1978年第5期。

③拙作《王仙芝黄巢起义始年考》即将在《文史》发表。

提到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两处谈到此书，一处说：“今考其书，即茅元仪之《平巢事迹考》”，另一处说得更详细：“明茅元仪撰。是编因明季流贼猖獗，官兵不能御，元仪建策，欲用宣大降丁（指唐末宣大节度使沙陀人李克用所部）剿之，因谓唐黄巢发难时，沙陀五百，即能歼其众，而唐人疑不肯用，迄至亡国，故叙录其事，冀鉴其祸而用己说。”①

后来此书作者之所以成为疑问，被误认为“宋人”所著，完全是藏书家曹溶和陆烜以假充真的缘故。曹溶是明清之际有名的大藏书家，曾收藏唐集自柳河东以下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以下一百十五家②。他把他的丰富珍本藏书汇集成《学海类编》，芝园居士为《学海类编》作序说：“所录古今书计有四百二十余种，皆海内士大夫家藏抄本，世所稀见者”。③著名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曾在北京参考了曹溶的多种秘本④。按说曹溶的《学海类编》在编纂成书时不应出现太大的错讹，因此当他把《平巢事迹考》编进该丛书“史参”类而将作者署为“宋撰人阙”时，也就使后学者深信不疑。到陆烜编《奇晋斋丛书》，又一次收进《平巢事迹考》，以讹传讹，更认为得自“元抄本”⑤，就使后人越来越相信这本书确为宋人所著了。

但是很明显，上述所云，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笔者最近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有幸看到了一批曾被清政府查禁的茅元仪的佚著，尤其看到了清初抄本的《平巢事迹考》、以及茅元仪《石民四十集》中的《平巢事迹考序》，给我们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可以

---

①分别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52史部八杂史类存目一，卷54史部十杂史类存目三。

②王渔洋《池北偶谈》

③晁氏聚珍板《学海类编》序。

④见谈迁《北游录》《纪邮上》，中华书局1960年版55页、58页。

⑤见丛书集成本《平巢事迹考》排印说明。

确证,这本长期以来作者不明的书,肯定是明末人茅元仪的作品。

我们先看一看《平巢事迹考》清初抄本的记载。该抄本有一段光绪初年该书藏者王基磐的跋,曰:

明茅元仪《平巢事迹考》一卷。首有自序一篇,末附上南京吕大司马议一篇,国初钞本,谦牧堂藏,后归许溟生尚堂,许氏书散出,予收得之。盖与旧钞芦浦笔记同函云。光绪辛丑秋九月古弦王基磐记。

又说:“茅氏著书多言辽事,乾隆时多列入禁书中。余尝收得精钞戍楼闲话一种,今陈刘倬云家,此本亦倬云送还与予者”。该抄本附有茅元仪编抄《平巢事迹考》的一篇序和《上南京吕大司马议》。《平巢事迹考序》在茅元仪的《石民四十集》亦载入,在其集卷之十三,与清抄本所录序小有出入。《四十集》的该序全文为:

仪不佞方捍奴虑插,颶颶计海盗之中,倭杂居大半,四夷之强,一时并起,中国无以支,何暇计流寇哉?然奴、插祸在肌肤,海盗祸在荣卫,流寇祸在腑脏,此知者所共知也。流寇之祸,历代有之,如赤眉铜马之于汉,杨进王善之于宋,皆当极乱之时,民无所归,势<sup>①</sup>固然也。唯汉之黄巾,唐之芝、巢,与本朝之刘赵辈,丁太平之时忽焉自起,天若为之。然汉唐酿无穷之祸,而本朝仍谧宁之旧<sup>②</sup>,亦时为之也。今日之流寇,与刘赵等,似不足深虑,而四方之民,望风而从,积日之久,已半仙巢。蒙窃惴惴乎,<sup>③</sup>虞其事之似唐也。唐之祸极于后五年,及今而图,可以无唐之大决裂。然考古所以镜今也。唐方始祸之时,沙陀五百,即歼贼三十四,唐之谋臣唯恐夷响华,故使巢得揉天下,破两京。及诸道之师尽壁都城,终莫敢先登,始召雁门之帅,而鹑军四万遂奏全捷。然余焰犹降秦宗权,围赵犇,困朱温。苟非克用振其余勇,底平之事何可庶几?夫用夷之祸在游<sup>④</sup>历内地周游城郭,艳风土之繁盛,习武备之削弱,狡焉生心,犹不旋踵,骤胜必骄,久聚必溃,岂不深长计哉!然蒙有三疑焉:移唐祚者朱温也,非克用也。温乃巢之余党耳,苟无克用,温之得为所欲为,岂不早十数祀乎?此

①清初钞本《平巢事迹考》序自“势”以上阙。

②清初钞本“旧”为“祸”。

③清初钞本“乎”为“焉”。

④清初钞本《平巢事迹考》“游”为“存”

一也。回纥之所以为唐祸者客也，至今日之夷则穷而归我，久服戎行，达官随从，本朝历有典制，此二也。既<sup>①</sup>恐其羸我弱而艳我盛，登莱之役，彼之人中原亦已久矣，此三也。但须统率得其人，驾驭得其道耳。用忠义沉悍之将，而无使二心之属为之帅，此统率之道也。督以名将，使统率者犹为之属，则指臂之势矣。监以文吏，使所过之地刍食无阙，秋毫无犯，此驾驭之道也。不早是务，必使祸极而图之，终无踰于此，而唐之已事不灼然乎？走在士伍，不与谋大计，然陈子公能屈指而计吉语<sup>②</sup>者，唯其习耳。巧不过于习之门走，窃自料巧固不能习，则未敢多让也。姑节略往事为《平巢事迹考》，使知者自考焉。

从这篇序文，我们断定说，历来在作者问题上被搅得混着不清的《平巢事迹考》，为明末人茅元仪所著，应该是不会有疑义了。

## 二

茅元仪为什么要“节略”这本《平巢事迹考》呢？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考古所以镜今”，或如他对吕大司马上书中所说的，“式古准今，用夷盪寇”。他认为北方少数民族满、蒙（“奴”与“插”）只不过是肌肤之病，海盗也仅是气血之亏，内部的农民起义才“祸在腑脏”，是最危险的。所以他主张，利用少数民族的兵力，镇压内地的农民起义，就如同唐末利用沙陀李克用的力量镇压黄巢起义一样，才庶几可免于“无穷之祸”。这就是上引那篇序文全篇的宗旨，也是他辛辛苦苦“节略往事”抄录《平巢事迹考》的目的。

茅元仪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他生于公元1594年（明万历22年），死于明亡前夕。这一时期正当明朝内忧外患，“国运倾圮”、“天下鼎沸，恐过于隋季”之时。茅元仪曾形象地比喻说：“今海内土崩之祸，在于旦夕，观其情势，似东海之极水至而返，夏热之

①清初钞本《平巢事迹考》“既”为“即”

②清初钞本《平巢事迹考》无“语”

下化而为寒，虽有至人，无可奈何”<sup>①</sup>。当此“兵变于内，敌窥于外”的“脊脊多事”之秋<sup>②</sup>，身为官宦之后的茅元仪，自小就卷入到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旋涡之中。幼年时，父茅国缙“以再覲入长安，留家于近畿，近畿盗贼充斥，白昼攻城邑”<sup>③</sup>，领教了农民起义的威力。1618年至1623年（明万历46年至天启三年），即茅元仪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时，努尔哈赤的后金全部占领了辽东平原，逼近长城。茅元仪是一个对明王朝忠心耿耿的臣子，他十几岁就攻读兵、农、史书，以求挽救明王朝之道。1619年（明万历47年）他给徐光启的书信中曾写道：“元仪自幼阔迂，喜读兵农之道”<sup>④</sup>。二十多岁时，茅元仪在京师与一些有志青年“皆以奇策剑术相高”<sup>⑤</sup>。他曾经与好友费元朗互相击节相许：“使当战死，旗鼓相当，竭智毕能，百败不休”<sup>⑥</sup>。

愚忠于明朝廷的思想，使茅元仪数次向皇帝献策。二十五岁那年（1618年，明万历46年），他在一次科举考试中，为明王朝的出路“条画垂万言”<sup>⑦</sup>，结果遭到冷遇。以后他又多次上书当朝权臣，表示“耿耿不能忘者以世沐国安”，“不敢忘尽忠于朝廷”，希望“能效其尺寸……此心欲忠于朝廷者，则固梦寐不忘也”<sup>⑧</sup>。1622年（明天启二年），茅元仪又一次向明朝皇帝提出系统的政治经济主张，题名一曰《冒言》，意为“冒天下罪而言之”，二曰《蠶谋》，意为非肉食而为蠶食，也应“效其尺寸”，为朝廷出谋划策，三曰《靖

---

①茅元仪《石民四十集》（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崇禎刻本）卷90《报樊山王书一》《报樊山王孟尝书二》。

②同上卷5《再汰官兵疏》，卷82《寄唐存忆中丞书五》。

③同上卷38《先妣累勅封丁安人行实》。

④同上卷69《与徐玄扈赞善书》。

⑤同上卷16《谢长秋桂岭吟序》

⑥同上卷25《费元朗传》

⑦同上卷14《冒言序》

⑧《石民四十集》卷58《上叶福清相公书五》。

草》，意在“献先王之说”使天下安靖，“中兴之业必就”<sup>①</sup>。

正是出于对明王朝“肝脑在地”的救亡心情，茅元仪编抄了《平巢事迹考》。正如他在《事迹考》序中所述的那样，其目的不外乎“考古所以镜今”，向皇帝献策利用少数民族兵力镇压农民起义，以免象汉唐最终覆亡的“无穷之祸”。根据《石民四十集》的前后编排次序，此考大致在明天启末年所编。这时，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领导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正方兴未艾，东北辽势也十分紧张，明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从这里可以看出，茅元仪的政治嗅觉是相当灵敏的。与此同时，他还向新登基的崇祯皇帝，献上了他辑录的《武备志》二百四十卷，“上言东西夷情、粤闽疆事及兵食富强大计”<sup>②</sup>。

茅元仪一生官运不佳，因为他落落寡合，“自负经奇，恃气凌人”，常为权臣所恶。虽自少年即常“慨然欲以有为”，却往往不为当政者所用，直到三十岁左右，才在杨镐幕中充任僚佐<sup>③</sup>，后来为孙承宗所赏识，逐渐受到重用，1629年（明崇祯二年）在保卫京师的东便门之役立了战功，被授为付总兵之职。但不久就又遭权臣所忌下狱，谪戍福建漳浦，以后几次上书求复，皆被阻抑，以致郁郁不得志，“蚤夜呼愤，纵酒而卒”<sup>④</sup>。

### 三

茅元仪是一位多产作家。根据他给谭元春的信，到他四十岁时，就已自刻出版了他的所著诗文共约三百卷：“不自量辄自哀刻

①同上卷6《拟上皇帝书》，卷14《冒言序》《蓑谋序》《靖草序》。

②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茅待诏元仪》。

③《石民四十集》卷14《青油史漫序》：“熹庙癸亥（1623年）九月，余始入督师杨公幕……”

④《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茅待诏元仪》。

其文曰四十集，其诗亦有数种，合之有二百卷，而又加之外集共三百卷，冬可竣矣”<sup>①</sup>。据其《与潘木公书》，这些著作中，有诗五十二卷，文一百四十八卷，另有“说家者流”《青光》十卷，《青油史漫》二卷，《六月谭》十卷，《掌记》六卷，《督师纪略》十三卷，《暇老斋笔记》三十二卷，《福堂寺贝余》五卷，《戍楼閒话》四卷，《澄水帛》十三卷，《艺活甲编》若干卷，加上《平巢事迹考》和大部头的《武备志》，以及在四十岁时尚未刊出的《易会》、《史争》、《史旯》、《史快》、《略书》、《辅臣谏》、《山志》、《亦叹录》、《征异录》等，这些著作合在一起，约在千卷以上<sup>②</sup>。

但是，可惜的是，茅元仪如此丰富的著作，留传下来的却很少。目前在各大图书馆所能最常见到的就是一部他编纂的《武备志》。

这是为什么呢？这不得不归咎于清朝初年统治者的禁毁书的政策。三十年代，洪煊莲先生尝论清初禁书政策云：“……复逼缴禁书，尽行销毁。其遭禁之书，多为明末清初之著述，谓其词意于清人有抵触者。吾人试取《禁毁书目》及各省所进之《违碍书笈单》观之，即可见清室摧残旧籍之成绩。……其全毁之书，竟至千数百种之多。汉成帝之收，秦始皇之焚，清高宗以一人兼之”<sup>③</sup>。

茅元仪长期与清政权处于敌对阵营，曾在专与努尔哈赤对垒的孙承宗麾下任付总兵，为孙“募舟师”，设计了孙承宗部整个水军的配置，是孙承宗在东北抗清的主要助手，其重要性和袁崇焕约等<sup>④</sup>。他的文集中有很多对女真和后金不敬之语，提到满兵，不是“奴”就是“丑”，称努尔哈赤为“奴酋”，动不动就指斥他们“夷虏猖獗”，“狡计叵测”。他不止一次向皇帝表示要“破家为国，捨命当

①《不民四十集》卷77《与谭友夏书》。

②《石民四十集》卷77《与潘木公书》

③《洪业论学集》第51—52页。

④茅元仪《督师纪略》（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明末刻本）卷5、卷9、卷10。

虏”<sup>①</sup>。很自然，他的著作首当其冲地成为清朝禁毁对象。从《清代禁毁书目》的记载看，茅元仪的所有著作几乎全部都在被禁之列。在“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中，有他的《暇老斋笔记》、《六月谭》、《石民乙亥集丙子集丁丑集戊寅集》、《石民集》、《督师纪略》、《横塘集》、《掌记》、《青油史漫》、《福堂寺贝余》、《瞌睡余》等<sup>②</sup>。在浙江省查办奏缴应毁书目”中，茅元仪的《复辽砭吃》、《石民赏心集》、《西庵集》、《渝水集》、《江村集》、《又岘集》、《艺活甲编》、《戊楼閒话》又一次列入禁书<sup>③</sup>。他的《武备志》、《青光》等，则被列在“远碍书目”中。这样，茅元仪的几乎所有著作，皆成为禁书了。

清代禁毁书目中，没有提到他的《平巢事迹考》。为什么偏偏这一著作被疏漏而幸存、并被堂皇编进“四库全书”存目中去了呢？这得感谢清初一些藏书家的（无意或有意的）疏误。清初抄本《平巢事迹考》书前的光绪时王基磐的跋云：“此书曹倦圃（即曹溶）学海类编存之，后平湖陆梅谷（即陆烜）刻奇晋斋丛书，收入此种，题曰宋撰人阙，此据元人钞本，盖皆不知为茅止生所著也。四库全书杂史类存目一始正此误。然但云曹氏为黠贾所给，删去原序，而不云其后附有上南京大司马议，则亦似未见全本。予意采书时以议中一用之以逐奴而奴终宵遯等语，殊涉忌讳，乃先撤去之耳”<sup>④</sup>。看来王基磐的论断是对的，清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的编辑者们大约是没有看到附茅元仪原序及其《上南京吕大司马议》的原书，而是根据《学海类编》本和陆烜的《奇晋斋丛书》收藏本所下的结论。笔者对于四库全书编者所云曹溶“为黠贾所给”的说法是存疑的。因

---

①《石民四十集》卷1《乞定庙算规模疏》，卷2《辨诬疏》，卷5《申明兵制详酌调集疏》。

②请参阅姚觀元《清代禁毁书目（补遗）》（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50、54、55、57、60、61、62、75、78、79页。

③同上第103、106页。

④清初抄本《平巢事迹考》卷首（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藏）

为曹溶是茅元仪的同时代人，崇祯丁丑（1637年）进士，又同为浙江人（曹为秀水人，茅为归安人，秀水属嘉兴府，归安属吴兴府，两地相隔仅数百里），且同为当时藏书大家。那么，曹溶对《平巢事迹考》为茅元仪所编辑，难道会毫无所知吗？我觉得这是难以说得通的。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曹溶有意保存下这本书，购书后预先把茅元仪的“殊涉忌讳”的原序和那篇“议”一并删掉，然后编进《学海类编》。尔后，这本《平巢事迹考》就破例地唯独幸存了下来。过了一百多年，到乾隆己丑年（1769年），又被陆烜当作宋人撰“元人钞本”编进《奇晋斋丛书》。此后以讹传讹，这本书也就不明不白以“宋撰人阙”而行之于世了。

封建专制主义淫威总不可能毁灭所有文化，清初被禁的书终有一部分仍散落在民间，这些书也就正由于此而愈加珍贵。即如茅元仪的著作，在有清一代便时有所出。光绪年间王基磐即曾从书商处看到过《石民四十集》。另一个叫刘倬云的，还得到过茅元仪的另一本《戍楼闲话》<sup>①</sup>。民国以后孙殿起从多年经手收购的旧书中，也曾见到过流在民间的茅元仪另一些著作，就其《清代禁书知见录》所记，前后见过的茅元仪佚著即有：明天启刊本的《又岷集》、崇祯间刊本的《石民四十集》、天启刊本《石民戊寅集》、《石民渝水集》、《石民横塘集》、《西庵集》和天启刊本《青光》、《掌记》、《青油史漫》、《暇老斋笔记》、《东便门记事》，崇祯间刊本《三戍丛谭》，以及天启元年刊本《武备志》等，他还见到过一本明天启间刊本《平巢事迹考》<sup>②</sup>。

幸存的茅元仪上述这些著作，现大部藏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计共十六种：

---

① 清初钞本《平巢事迹考》王基磐跋。

② 参阅孙殿起《清代禁书知见录》第15页、51页、67页、88页、90页、172页、188页《外编》第6页、14页、25页。

- 《三戌丛谭》(十三卷) 明崇祯刻本  
 《六月谭》(五卷) 明崇祯刻本  
 《平巢事迹考》(一卷) 清初抄本  
 《石民四十集》(九十八卷) 明崇祯刻本  
 《石民又岬集》(五卷) 明末刻本  
 《石民甲戌集》(存五卷) 明崇祯刻本  
 《石民未出集》(二十卷) 明天启七年自刻本  
 《石民江村集》(二十卷) 明末刻本  
 《石民渝水集》(六卷) 明末刻本  
 《石民横塘集》(十卷) 明末刻本  
 《石民赏心集》(八卷) 明末刻本  
 《武备志》(二百四十卷) 明天启刻本  
 《野航史话》(四卷) 明末刻本  
 《掌记》(六卷) 明崇祯元年自刻本  
 《督师纪略》(十三卷) 明末刻本  
 《暇老斋杂记》(三十二卷) 清光绪李文田抄本

以上诸种,除《武备志》和《平巢事迹考》清代有重刻本外,其它十四种都已不再在民间流传,成为孤本或稀本,而这些著作,却是我们研究明清之际、尤其是明末辽东战争的极为重要的史料。笔者诚挚地希望,把这些珍本加以整理出版,以供有志于明清史研究者参考。

